

「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」資料使用心得 分享



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

Newsletter Quarterly

黃毅志*

一、使用「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」資料做研究的優點

我在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，使用在 1984 年進行調查的第一期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成為第一位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而完成碩士論文者。我之所以選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，主要原因是它是現成的全國代表性大樣本次級資料 (N=8432)，而且參與問卷與抽樣設計者都是全國傑出的學者，所設計的問題大都有精緻的理論基礎，或能凸（突？）顯台灣本土的特殊性；問卷調查又採一對一面訪，具有良好測量品質（楊國樞、瞿海源，1993）；而我的碩士論文所要用到的變項，問卷上都有。

我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由於不必自己做調查，就能直接分析具有良好測量品質的全國代表性大樣本資料，而能專心閱讀文獻，進行統計分析與撰寫論文，成為全班惟一兩年畢業者；同時考上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班，成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第一位考上社會學博士班者，同年又得到台灣社會學會優良碩士論文獎；後來碩士論文改寫投稿，刊上三篇期刊論文，其中兩篇是 TSSCI 論文。我的博士論文仍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成為第一位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而完成博士論文者；博士論文改寫後，有多篇論文在期刊發表。博士班畢業後，我到台東師院（現改制為台東大學）任教，三年後升上教授，升等送審的著作全都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。

我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進行的研究可說相當順利，除了指導教授瞿海源老師為當時社會變遷調查計畫主持人，指導有方之外，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有許多優點也是重要原因，絕非個人能力較強所致。我到了台東大學已十一年，各年的國科會計畫絕大多數仍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可以省下資料蒐集所需要的大量時間，也幫國科會省錢，而專心閱讀文獻，進行統計分析與撰寫論文，同時也指導碩士班學生發表多篇的 TSSCI 論文，其中包括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（陳建志，2002）。

二、社會變遷調查的持續發展與使用資料要點

社會變遷調查從 1984 年開始進行，至今已 23 年，每年進行兩項不同主題的調查，樣本大致是台灣地區 18 至 75 歲的成年民衆，每項調查的樣本數大多在 2,000 左右。採用社

*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系（所）教授

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最大優點在於：不用自己做調查，就可以採用有高測量品質、低抽樣誤差（黃毅志，2000，2002）的全國代表性大樣本資料做分析，而且社會變遷調查經過不斷的改進，資料品質越來越好；調查問卷設計的理論基礎也越來越精緻，如包含許多細緻的文化資本、社會資本、人力資本、教育體制、勞力市場與階級結構變項；也越來越能凸顯台灣本土的特殊性，如加入很重要的補習教育變項（孫清山與黃毅志，1996），另外也採用針對本土設計的精緻職業分類（黃毅志，2002），如此較容易根據調查資料寫出夠水準的學術論文。

對於「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較容易寫出夠水準學術論文」的說詞，有些讀者可能會質疑：由於我自己參加調查的問卷設計，而知道問卷题目的理論或本土意義，所以我與所指導的學生才能做適當的分析，而寫出許多 TSSCI 論文；不過，對於許多沒有參加問卷設計者而言，卻會由於不清楚問卷题目意義，而難以寫出夠水準的學術論文。然而，根據我的經驗，我有很多論文是採用 1992 年進行調查的二期三次社會階層組資料做分析，這次調查在問卷設計時，我還是博士班學生，並沒有參加問卷設計，卻仍然能看出問卷题目的意義，原因在於：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階層，與參加問卷設計的社會階層老師，所讀過的理論文獻大致相同，所看到的本土特殊性也大致相同，所以能看出問卷题目的意義。即使沒有參加問卷設計，只要多讀文獻，如至今還經常被引用的社會階層研究經典之作 *The American Occupation Structure* (Blau and Duncan, 1967)，定期閱讀最新的國內外權威期刊，如社會學的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 (AJS) 與 *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* (ASR)，台灣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學刊，多留意本土特殊性，如產業轉型與高等教育急速擴充所帶來的特殊現象，就能看出問卷题目的意義，並寫出具體而紮實的論文。

社會變遷調查隨著時間的累積，前後各年調查的時間點差距拉長，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也就越來越能顯現社會變遷的趨勢，與分析造成變遷的機制，而越來越能達成研究計畫「分析社會變遷之目的」。現在 2007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正在進行中，與最早 1984 年的調查已相距 23 年，以相隔 23 年的資料做比較分析，當能看出明顯的變遷與分析造成變遷的機制，而得到許多有意義的發現。隨著時間的演變，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也就越來越有學術價值，並能根據研究結果，對於政策制定與台灣民衆做建議，也越來越有應用價值。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還可與過去的台灣地區調查資料做比較分析，如黃毅志與章英華（2005）根據 1997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，與顧浩定在 1970 年進行的台灣地區調查資料做比較分析，我們發現：在 1970 年時本省閩南、客家與外省絕大多數以同族群者為最要好朋友，族群的交友呈現高度封閉性，然而，到了 1997 年，跨族群交友比率提高很多；我們以族群的居住、職業與教育隔離日減，來解釋跨族群交友比率提高的變遷。不過客家

由於居住地一直集中在桃竹苗，跨族群交友機會提高較少。

三、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限制？

有些研究要用到很大的樣本數才能進行，而每次社會變遷調查的樣本數都在 2,000 左右，雖然已經很大，卻還不夠大。比如我曾經要比較原住民與漢人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，而每次社會變遷調查的原住民樣本數大概都 30 人左右，必須合併多筆社會變遷調查資料，才能得到足夠的樣本數以進行比較分析；我也就合併了 17 次社會變遷調查資料，共得到 620 個原住民樣本來與漢人做比較分析。我的分析指出，相較於漢人，雖然原住民多從事低階層的農工職業，不過原住民仍有晉升白領專業工作之途，主要是透過保障升學與分發而取得中小學教師與護士職業；此外，我依出生年次分組做比較分析，研究結果是原住民與漢人教育程度的差異越來越明顯（黃毅志，2001）。至於章英華、薛承泰與黃毅志（1996）爲了分析出身背景，透過高中職教育分流對於社會經濟地位取得的影響之變遷，必須依出生年次分組做比較分析，而且各組的樣本都要夠大，所需的整體樣本也就很大；只用一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樣本就不夠大，於是就合併 9 次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。

由於我在教育研究所任教，指導學生的論文必須跟教育有關，社會變遷調查是針對大都已完成教育的成年民衆做調查，如何分析教育問題？由於社會變遷調查對於成年民衆也調查他們過去求學時的重要經驗，如求學時家裏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如何？高中階段讀的是高中還是高職？公立還是私立學校？接受那些補習？以及最高學歷？我也就指導許多教育研究所學生，採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分析教育問題，探討出身背景變項，如家庭社經地位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族群，透過補習教育、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等中介變項，對於是否能升學（含升高中職、大學與研究所），升上的是公立或私立學校，高中或高職，與受教育年數所代表的最高學歷之影響機制與影響之變遷（陳怡靖，2001；陳怡靖與鄭耀男，2000；曾天韻，2004），以及教育年數對職業、階級、收入、心理幸福、工作滿意度等變項的影響之機制（陳建志，2002；黃盈彰，2002；賴威岑，2005）。

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分析教育問題，與一般以中小學教師爲樣本的教育學研究相較，有時反而會帶來一些突破。我發現台灣地區大分類職業中的專業人員，中小學教師大約佔了一半，如在 1997 年進行的社會變遷調查階層組資料中，專業人員共 116 位，中小學教師就佔了 66 位，而可將中小學教師從專業人員中獨立出來，以比較中小學教師與高層專業人員（如醫師、律師、大學教授）、其他專業人員、主管人員、事務性工作人員、技術工等大類職業人員相較，在許多重要變項，如工作滿意度、專業性、心理幸福、文化資本等重要變項上的差異。由於中小學教師樣本不小，在許多分析中，往往發現差異也不小，並

用路徑分析探討造成差異的因果機制，得到許多有意義的發現。如黃盈彰 (2002) 發現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工作滿意度最高，還高於高層專業人員，主要原因是中小學教師這項職業所得到的道德評價最高；賴威岑 (2005) 發現中小學教師在心理幸福中的成就感平均數最高，主要原因是他們的平均教育年數很高、收入偏高、社會網絡異質性 (Lin, 2001: 61-63) 最大。用全國代表性大樣本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能比較中小學教師與其職業的差別，並能分析造成差別的因果機制；而許多教育學研究只針對中小學教師樣本做研究，無法顯現中小學教師與其他職業相較有何獨特之處。所以，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分析教育問題，不一定會受到限制，有時反而會帶來一些突破。

但是，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的最大限制在於：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以成年民衆為調查對象，無法分析未成年民衆。這主要是無法分析大中小學學生的現況，以及相關的教育問題，如近年的大規模教育改革，諸如九年一貫、多元入學的成效與缺失，以及現在大中小學學生的學習成效、態度、行為模式與身心健康。此外，進行社會變遷調查主要是為了分析變遷趨勢，每年接受調查的樣本不必一樣，這樣就不需要對相同樣本做追蹤調查以降低調查成本；然而，由於它不是追蹤調查，也就無法精確分析台灣民衆隨著年齡成長而產生的變化，如事業發展、身心變化，以及造成變化之機制，也就無法釐清造成變項間相關的真正因果方向。例如，我曾使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做分析，發現對台灣民衆心理幸福影響最大的是社會網絡（這裏指人際關係），人際關係越佳，導致心理幸福指數愈高，而社經地位（包括本人教育、職業與全家收入）的影響就顯得有限（黃毅志，2002）。關於這樣的發現，有人可能會提出反向因果的質疑：應是幸福愈高導致人際關係愈佳。對於如此的質疑，使用社會變遷資料做分析就無法證實這樣的質疑是錯的；人際關係愈佳，心理也愈幸福的現象，是因為人際關係影響心理幸福？還是心理幸福影響人際關係的反向因果？還是兩者互相影響的雙向因果關係？這必須用追蹤調查資料做貫時性分析才能釐清。

四、社會變遷調查資料與其他大型調查資料的比較

近年來國內陸續有許多大型調查正在進行中，而且已陸續釋出許多資料讓學者們使用，這對國內學術研究的發展有很大助益。如張荳雲教授主持的「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(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, 簡稱 TEPS)」之中學生調查，彭森明主持「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之建置及相關議題之探討」之大學生調查 (簡稱高教調查) 都是追蹤調查，正可彌補社會變遷調查只針對成年民衆做調查，而且不是追蹤調查之不足。不過，如果要分析的是台灣地區成年民衆，特別是要分析長期社會變遷的趨勢，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應是最好的選擇。而且社會變遷調查採一對一面訪，具有良好的測量品質，這是許多大型調查比

不上的。

參考書目

- 孫清山、黃毅志 (1996)。〈補習教育、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〉。《臺灣社會學刊》19，2-44。
- 陳建志 (2002)。〈人力資源差異或性別歧視？就業市場性別階層化之探討〉。《中央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》14(3)，363-407。
- 陳怡靖和鄭耀男 (2000)。〈台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〉。《國科會研究彙刊：人文及社會科學》10(3)，416-434。
- 陳怡靖 (2001)。〈台灣地區高中、技職教育分流與教育機會不均等性之變遷〉。《台灣師大教育研究集刊》47，253-282。
- 章英華、薛承泰、黃毅志 (1996)。《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—兼論對技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意涵》。台北：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。
- 曾天韻 (2004)。〈台灣地區出身背景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之影響〉。《政大教育與心理研究》27(2)，255-281。
- 黃盈彰 (2002)。〈中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特性之研究—與高層專業人員等職業類別作比較〉。《政大教育與心理研究》25，149-177。
- 黃毅志 (2000)。〈教育研究中的學童自陳問卷信、效度分析〉。《國科會研究彙刊：人文及社會科學》10(3)，403-415。
- 黃毅志 (2001)。〈都市原住民階層變遷史〉。載於蔡明哲 (主編)，《都市原住民史篇》。頁51-89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。
- 黃毅志 (2002)。《社會階層、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：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》。台北：巨流圖書公司 (二版)。
- 黃毅志、章英華 (2005)。〈台灣地區族群交友界限之變遷：1970年與1997年的比較〉。《臺灣社會學刊》35，127-179。
- 賴威岑 (2005)。〈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心理幸福特質之探討：與其他職業的比較〉。《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》5(1)，159-195。
- 楊國樞、瞿海源 (主編) (1993)。《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：第一期調查計畫執行報告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- Blau, P. M. & O. D. Duncan. (1967). *The American Occupation Structure*. New York, Wiley.
- Lin, N. (2001). *Social Capital: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